

关于容闳的晚年

袁 鸿 林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①,广东香山人,著有英文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涯》^②。对于容闳的评价,史学界长期看法不同,有的认为他是近代中国早期改良派先进人物,有的认为他根本算不上改良派,而是洋务派的走卒,他的主张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利益。^③我认为,容闳的思想和活动基本贯穿了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性,容闳为在祖国实现独立、富强、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先进理想奋斗了一辈子,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为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先进人物。容闳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1828年至1854年,这是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他向西方寻求真理,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改良思想(以教育救国的留学生计划为标志);(二)1855年至1895年,这是他实践其改良主张而曲折摸索的时期,重要活动有去太平天国首都出谋划策和以一种“应变的姿态”参与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如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出等);(三)1896年至1912年,他参加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和辛亥革命,经历了由改良到革命的光辉转变。本文只拟对容闳的第三时期(即晚年)的主要政治活动和思想概貌进行论述。

一 容闳与戊戌变法维新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洪水般地涌进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极大地震惊了中国的先进者。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微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领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维新运动,于1898年(戊戌)达到了高潮。

容闳在美国得悉中国为日本战败后,激于爱国义愤,曾投书张之洞,主张向英国借款,购买铁舰,雇佣洋兵,继续与日作战,并在张的支持下去伦敦借款。借款失败后又回到中国面说张之洞,希望由他出面,聘请客卿,改革新政,但遭到张的冷遇。不得已,容闳到了北京,想有所活动。1896年,容闳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相识亦当在此前后^④。从此容闳便以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改良派的本来面目参加了康梁的维新运动。

当时,容闳有自己的维新计划。1896年他试图通过户部尚书翁同龢和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的赞助来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遭到盛宣怀等大官僚买办的

① 长期以来,不少论著均误其号为字而不知其字为何,此据其族侄孙容联芳撰《容闳传》订正,见何广棣:《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传记文学》三十五卷四期。

②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出版于纽约。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中译本《西学东渐记》,译本漏误甚多,故本文引用均据英文版,下略为“容自传”。

③ 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姜铎:《论容闳》(1982年9月16日《文汇报》);王永康:《容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吗?》(1983年4月4日《文汇报》);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④ 杨复礼:《梁启超年谱》,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72页;“容自传”,第288页。

阻挠而失败。次年容闳又转而试图集资修筑津镇铁路,因须通过当时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而遭到德帝国主义的反对,又失败。这些活动应归属于当时的维新运动范畴,因而得到康梁的支持。容闳的《续拟银行条陈》即发表于梁启超任主笔的维新派喉舌《时务报》上^①。康有为曾说过“容乃请筑津镇铁路,吾实助之,奉旨允行”^②。后来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百日维新”时,容闳的“总部成了维新派首领集会的地方”^③。

以容闳的熟悉外情、较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见解和丰富的西方知识,必然会对康梁的变法有过不小的影响。梁启超对容闳就颇为推崇,说容闳“学问最优”^④。在康有为的自述中我们也能见到容闳的影响,“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偏立各省各府县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可补救。……既与常熟(翁同和——引者所加,下同)言,荐容纯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又草折二份,交御史宋伯鲁、陈其璋上之。枢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⑤

宋伯鲁上于1898年3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的《请统筹全局折》和陈其璋上于前一日的《请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即是上述康有为所草,交他们分别上之的^⑥。宋折提出“募开一大公司,集款数万万,准其开办各省铁路矿务”的方案,说“于万国之中,美国最富,又不利人土地,若招集美商办此,彼必乐从,惟须得该国敬信之人,方能招集。臣闻江苏侯补道容闳少年游学美国,壮岁又奉使差,久于美地,前后二十余年,其为人朴诚忠信,行谊不苟,深为美人所敬信。若容闳往美集此公司,不必声明,以免各国生心”。陈折则从“设法自保,牵制各国”出发,提出“惟有多借美债”才能“除偿日本外,便可广开矿务铁路,境

外通商,以图自富。增强练水陆各军,多买船械,以图自强”,也说“……容闳在美多年,官商推重,如遣与美商速行,计借二、三万两,一月之内,必可有成……”。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康有为曾与容闳就几乎所有的重大变法新政进行过商量,而这些内容早就主张或实践过的,显然有容闳的影响,并且商定由容闳担当了借美资的重任。

在戊戌变法进入高潮时,维新派面临了慈禧等顽固派发动政变的严重局势。在血雨腥风将至的前夕,容闳曾参与了营救的谋划。康有为自述:“……属谭复生(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复生入城后,卓如(梁启超)至金顶庙容纯斋(容闳)处,候消息……闻袁知变不奉命云。容纯甫欲请美钦使,然以其无兵,无济于事,却之……”^⑦政变发生后,容闳曾致函李提摩太营救梁启超^⑧。康有为出逃后致函李提摩太,其中附函容闳,让李提摩太“代妥密交,各情并告知,此函亦并示知”容闳^⑨。容闳自己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也被撤差追究,只得出逃。

容闳大康有为三十岁,大梁启超四十五岁,不仅在思想上可说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先驱之一,而且还以康梁的尊长兼战友的身份直接加入了维新运动,与康梁同战斗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二 容闳与自立军起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

- ① 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303—304页。
-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21页。
- ③ 容自传,第241页。
- ④ 《戊戌政变记》,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85页。
- ⑤ 《康南海自编年谱》,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1—162页。
- ⑥ 此两折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
- ⑦ 《康南海自编年谱》,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1—162页。
- ⑧ 《康南海墨迹·程演跋》,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141页。
- ⑨ 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14页。

国运动接踵爆发。谭嗣同密友、维新派左翼的唐才常面对政变后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更加腐朽和帝国主义的加紧对华侵略瓜分,利用义和团在北方掀起反帝高潮的良机,发动了1900年8月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情况复杂,既有康梁的插手,也受到孙中山的支持,因此提出的纲领宗旨模糊。但实际的作用是在“勤王”旗下起兵打击满清政府,与惠州起义南北呼应,是应当被肯定的一次爱国性质的起义^①。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召开“国会”,随即至汉口,计划把自立军组成七军,定于8月9日同时起义。因等待康有为的海外汇款而一再展期,致使原定步骤打乱。秦力山于8月11日在占领大通后失败,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未及举事即被张之洞捕杀,起义失败。

容闳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成为这次起义的重要人物。上海国会召开时,有聚集沪上的名流八十余人到会,容闳被公举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任总干事。容闳在会上“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②。容闳在自传中说自己“创立了国会”,当时的与会者章炳麟也说“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闳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夏口”,又说发表的宣言是“容闳手笔”^③。当时自立会推容闳“主外交”^④。参与了机密,如容闳曾运动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成立中国独立政府”^⑤,密购输运自立军起义军火。因此,张之洞在镇压自立军起义时,把容闳与康有为、唐才常并列为“勾匪作乱,私运外洋军火”的首犯^⑥。

参加上海国会和自立军起义的人,政治面目颇为复杂,即有改良派的左右翼,也有革命派和后来转变为革命派的。那么,容闳此时的政治立场如何?我认为他主要是倾向革命的。容闳读过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回国

后同情赞扬太平天国革命而去天京出谋划策,美国南北战争时又曾去华盛顿报名当志愿兵,可见其思想是很激进的。尤其在戊戌政变后,容闳对清政府的幻想渐趋破灭,于1899年迁居香港后开始与兴中会人物交往。

容闳侄儿容开(字耀垣,号星桥),幼时曾随容闳赴美留学,回国后于1891年结识孙中山并由孙介绍入兴中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深得孙中山信任^⑦。孙中山曾将容开介绍给唐才常、林圭,“庚子汉口自立军之活动,大得其力”^⑧。唐才常弟也说他在此役中“筹谋赞助,极是周到”^⑨。叔侄俩共同在自立军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失败后同被通缉,又一起逃避^⑩,联系密切,政治态度应较一致。似乎正是通过容开,容闳与香港兴中会重要人物建立了联系。

据谢缵泰的记载,1900年3月31日,他与容闳在香港“讨论了政治形势”。4月2日,他与容闳“倾心交谈良久”,容闳表示了同意他的“在能干的基督徒领导下的团结、合作政策”,容闳话中流露了对孙中山的敬仰。4月3日,由谢缵泰安排,容闳与杨衢云“就加紧联合和合作事宜”进行了“秘密会谈”。当时容闳打算去美国,故在谢的记载中写道:“1900年4月4日,容闳博士乘‘中国皇后’号轮赴美。我致函孙逸仙博士,建议在日本见容闳博士”。显然,此函是给容

- ① 参见汤志钧《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 ② 孙宝钰:《日益斋日记》,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540页。
- ③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05页、110页;《唐才常集》第277页。
- ④ 尚秉和:《辛壬春秋·革命源流》。
- ⑤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10页。
- ⑥ 叶德辉:《觉迷要录》卷二。
- ⑦ Thomas E. Latrue:《Chinas First Hundred》P.143.
- ⑧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三十六年组织史》第40页;《革命逸史》三集,第23页。
- ⑨ 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三期。
- ⑩ 尚秉和:《辛壬春秋》;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29页。

撰写的一封介绍信，而容闳当时政治态度当然是赞同革命派的。革命派从此一直对他表示信任和敬仰。当时兴中会正在谋求与康梁合作，谢对此主张甚力。他先后见过康有为、康广仁，并就合作事达成过初步的谅解。谢甚至提出让容闳当会长来协调联合后的各党派之间的矛盾。他写道：“1900年4月18日：杨衢云来看我。为了防止各党派之间的敌意和猜忌，我竭力提议让容闳当统一维新党的会长”^①。

容闳与康梁有很深的情谊，又赞同兴中会的革命，作为两党之间的协调者，他具有理想的条件。这可能就是谢纘泰、杨衢云当时的考虑，介绍容闳去见孙中山也似乎与此事直接有关。无疑，容闳十分赞成兴中会与康梁合作，前引他同意谢的“政策”一句，即指此事。不过，是年4月容闳并未去美国，故未去日本与孙中山晤面，而是到了上海，以主要是倾向革命的政治立场参加上海国会和自立军起义。至于“合作”一事，后来由于康有为一味不忘“今上”，拒绝合作，未获结果。

说这时期容闳的政治立场主要是倾向革命而不说他是完全的革命派，那是因为他当时还未能摆脱对康梁旧情的纠缠，并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也未能割断与康梁的联系。据1902年容闳的日记，他与梁启超有书信往还。1903年梁启超游美国时，还特意拜访了居住哈佛市的容闳^②。1905年康有为也去拜访了容闳^③。容闳曾参与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界人士布司(Charles B. Bootle)帮助康梁筹款和训练军队等活动，直到1908年还幻想通过同盟会、保皇会及其他秘密团体的联合来发动起义推翻清政府^④。

三 容闳与辛亥革命

1900年6、7月，孙中山等兴中会人员幻想同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试图运

动李在两广独立。孙中山在给李的幕僚刘学询的函中，谈到独立后的政府外交工作可让何启和容闳“各当一面”^⑤，体现了孙中山已对容闳信任。自立军失败后，容闳不仅对于清政府的幻想荡然无存，而且对于帝国主义帮助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豺狼面目看得更清楚，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更加突出，革命的要求越发强烈，虽然年过七旬，但仍不辞辛劳，奔波于革命。9月上旬，容闳曾避难逃至日本门司，晤孙中山，并同行至神户、横滨等处。当时孙中山正在为惠州起义作准备，容闳似乎与闻了一些筹划工作^⑥。

1901年，刘成禺去香港拜见容闳，留下了当时容闳思想面貌的记载。容闳对他说：“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美)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船货，其举动何殊义和团？……孙逸仙……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勖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⑦

当时香港的几个兴中会会员正在策划起义。谢纘泰于1899年11月结识了洪全福(三合会领袖，传为洪秀全从侄，一说三弟)后，就开始了谋划夺取广州以建立一个“共和国政府”的起义。谢把军事托付洪全福，经济上则由兴中会会员、香港富商李纪堂出资五十万^⑧。1901年1月，杨衢云被清政府派人刺杀后，谢加速发动起义，经两年的准备，定

① Tse Tsan-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P. 18.

②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第96页。

③ Edmund H. Worthy Jr.: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y Review》Vol. XXXIV, No. 3 (August, 1965).

④ 罗香林: 《早期留学美国的容闳与中华民国创建之关系》, 《东方杂志》复刊9卷5期。

⑤ 冯自由: 《革命逸史》四集, 第99页。

⑥ 《宫崎滔天全集》(日文版)第五卷, 第878页;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第48—49页。

⑦ 刘成禺: 《世载堂杂忆》第114—115页。

⑧ 冯自由: 《革命逸史》四集, 第51页。

于1903年1月28日(中历壬寅除夕)在广州发动起义。但在举事前事泄,未及起义即遭镇压。孙中山当时正在越南,对这次起义“由港中同志函告稍知概略”^①。李纪堂曾对将去越见孙中山的陈少白说了“是役计划经过,并谓待吾夺得广州即迎孙中山先生回粤”^②。孙中山对这次起义评价甚高:“自惠州失败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其受革命风潮所感兴起而图举义者,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③

容闳从1900年9月至1902年5月基本居于香港,与谢缵泰、李纪堂过往甚密,对于谢欲“在广州举义,亦极表同情”^④。《革命逸史》记载谢在计划成功后组织政府问题时,“提议推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众无异义”^⑤。谢自己也说:“1901年9月26日,我与李柏(纪堂)商议,他表示乐意与我一起组织另一次夺取广州的起义并建立一个以容闳博士为总统的临时政府。”^⑥当谢、李特地与容闳商量时,容对谢的计谋、李的疏财和洪全福的勇略,极为赞许,但说应争取国际上的声援,尤其是美国。须先往联络^⑦。容闳于1902年5月离港,7月在旧金山上岸。不久容闳收到了谢缵泰8月13日函,其函要求容闳“在美国组织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支持。”9月21日容闳复函说:“我已准备好在世界此端,尽我最大的能力来满足世界彼端的你的要求。尽快把暗号或密码转送给我。这是我们通讯必不可少的附属品。”^⑧由于起义不久失败,谢也开始退出武装斗争,转而着重文字宣传,他对容闳的联系也中断了五年。其间容闳在美国却一直积极活动,他相继物色了荷马李和布司。但由于他当时未能认清康梁保皇会的反动倒退的实质,一度支持他们。然而革命和保皇毕竟水火不能相容,决裂是必然的。

直到1907年7月18日,谢又记道:“我收

到容闳博士函……保证对我的继续坚决支持”。“1907年10月22日:我收到容闳博士函……提出了他的促使革命成功的计划”。容闳在1908年7月14日致谢的函中已明确“谴责了康有为和他的‘保皇会’党,”在1910年4月13日致谢函中又“激烈痛斥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并告知谢他见到孙中山的事^⑨。

1909年1月,容闳已致函布司和荷马李,要他们转而支持孙中山。经容闳的介绍,孙中山与荷马李等建立了通讯联系,并于是年底与布司之友阿伦(W.W. Allen)在纽约进行接触。同时容闳函约布司和荷马李在洛杉矶附近的长堤举行会议。1910年1月孙中山途经洛杉矶时曾与荷马李晤谈一日。3月上、中旬孙中山与荷马李、布司在洛杉矶多次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孙中山与容闳亦有晤面和书函往来。通过会谈,他们制定了起义计划,内容大致是:一、暂停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二、以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司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向纽约财团贷款,并由孙办理一个由国内各省革命派代表签署的文件,作为贷款的证据;三、运送在美训练的军官若干,以充实革命力量;四、贷款总额为350万美元,分四次;五、筹组临时政府^⑩。

这些会谈对后来孙中山的指导思想和实际部署都有很大的影响。1910年6月孙中山抵日本,与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凤等商议,落实了上述计划的一、二项决议,谋设秘密

① 陈春生:《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16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第162—163页。

③ 孙中山:《革命源起》,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10页。

④ 前揭陈春生文。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四集,第71—72页。

⑥ 前揭Tse Tsan-tai书, P. 20。

⑦ 前揭罗香林文。

⑧ 前揭Tse Tsan-tai书, P. 22。

⑨ 前揭Tse Tsan-tai书, PP. 24—25。

⑩ 前揭罗香林文和《孙中山年谱》第103页、第106—107页。

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的活动。11月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重要秘密会议,有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和国内东南各省的代表参加。次年1月黄兴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跑马地35号成立统筹部,一面派人于广州指挥发动起义,一面派人至长江流域宣传革命,策应起义。不久就有“三·二九”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致函容闳,充分肯定其革命劳绩,称容闳为“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的“老同志”,说:“当此破坏之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我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①可是,容闳从1910年5月起已患中风,孙中山函到达时,已卧床不起,不久于1912年4月21日溘然长逝于异乡了,终年八十四岁^②。

即使在病危中,容闳想念的只是祖国,思虑的也只是革命。在他尚能写作时,容闳接连于1911年12月19日、22日和29日致谢缙泰三函,留下了容闳一生最后的政治见解和革命立场的光荣记录。容闳在22日函中写道:“我目前所焦虑的是现北京的残暴政权将会为袁世凯、唐绍仪一伙的势力所把持,他们又将千方百计地来左右上海会议采纳君主立宪制度而成为一个由袁世凯、唐绍仪控制的新政府。这无疑会象满清统治复辟一样的黑暗。新中国应当掌握在真正的中国人手中,而不能落入那些连结着干涉我们内政的欧洲野兽的两面派和叛徒手中……”^③,这种见解在当时可称得上最为清醒而深刻的思想了。19日函是致全体革命者的,附于22日的函中,容闳在此函中写道:“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那些近三百年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既然你们已经把满清统治

者踩在脚下,那么也不要让那些政治两面派(不管他们的代表们多么能干和善于花言巧语)把你们诱离你们坚定的初衷,即召唤共和国的到来”。容闳一再表示必须丝毫不妥协地坚持共和制。他密切注视着袁世凯利用上海和议、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玩弄阴谋的情形,故一再告诫革命者不能让权,不能听信袁世凯,并揭露:“无论袁世凯通过唐绍仪的嘴皮说出什么,都不要相信。你们应当认定他们野心勃勃,袁世凯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他在1898年出卖了他的主上光绪皇帝吗?叛徒岂能被信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而受着外国驻京外交官如此的推崇,他从满清王朝的崩溃中捞到了好处……”^④。这些真知灼见,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没有对革命的赤胆忠诚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是说不出的,当然容也有局限,在函中也流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对内战的恐惧等。

在12月29日函中,容闳请谢在去南京出席孙中山就职典礼时转达他对孙的衷心祝贺,并表示他十分渴望能回祖国亲眼见一见梦寐以求的新共和国,在去世前结识所有的革命领袖。遗憾的是容闳唯一的最后愿望竟未实现。容闳留下了遗言,让他两个生长在美国的儿子回国服务,以继其未竟之业。容闳族侄孙记其事道:“公易箦时,犹囑其二子颢形、颢槐,弃所营业,回助祖国。二子良不愿,缘当时均有优异之职业,月俸甚厚。公责之曰:‘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惟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子者’。二子逼于正义,乃从父命遄归祖国”^⑤,后来容颢形任矿冶工程师,容颢槐曾任广州军政府军火局长,均死于国内^⑥。

①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227页。

② 孙中山还寄相片一张赠容,见1912年4月22日《哈城日报》(Hartford Courant),特引高宗鲁:《有关容闳的史料问题》,《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三期。

③ 前揭Tee Tsan-tai书, P. 27.

④ 前揭Tee Tsan-tai书, P. 27.

⑤ 前揭何广校文。

⑥ 前揭高宗鲁文和刘成禹书,第116页。